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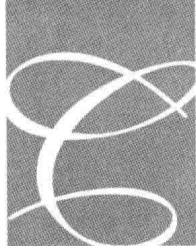


产业组织与竞争政策前沿研究丛书

政府激励与规制波动： 机理、影响与治理

陈长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产业组织与竞争政策前沿研究丛书

政府激励与规制波动： 机理、影响与治理

陈长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府激励与规制波动: 机理、影响与治理/陈长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产业组织与竞争政策前沿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8557 - 5

I. ①政… II. ①陈… III. ①工业管理—行业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F42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054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安全和健康等社会性规制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各个领域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所造成的影响已远远超出社会性规制范畴。过度追求高速增长是造成社会性规制问题日渐严重的直接原因，更深层原因则在于当前所实施的地方政府激励模式。然而，在人们对于安全问题频发深恶痛绝之时，却又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增长。当前，仅有少数学者从经济增长与社会性规制之间关系角度展开分析，使现有研究难以从本质上剖析当前中国社会性规制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不利于中国社会性规制体系的完善，还将对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深刻理解社会性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性规制体系完善，使其尽可能小地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十分重要。

鉴于此，本书以社会性规制过程中广泛出现的“一刀切式”治理、“走过场式”治理等带有鲜明中国转型期特征的现象作为研究起点，并将地方政府激励模式引入社会性规制的分析框架，提出规制波动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下问题：第一，规制波动形成机理的分析；第二，规制波动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第三，规制波动对规制本身所造成的影响；第四，地方政府对社会性规制制定所产生的影响。以上四个问题构成本书核心内容。

本书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过度的经济增长激励与硬化的社会稳定约束使得地方政府目标存在明显双重性，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权衡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发生事故之前，事故的偶发性以及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了地

2 政府激励与规制波动：机理、影响与治理

方政府的投机倾向，规制治理漏洞的存在又给其操作提供了空间；发生事故之后，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使得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改变，从而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上述因素的耦合作用最终导致规制波动现象的出现。

(2) 中国煤矿安全规制对煤炭产量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死亡人数超过门限值时，安全规制对煤炭产量影响较大；而当死亡人数低于门限值时，安全规制对煤炭产量影响明显变小，且在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

(3) 规制波动对安全规制效果本身也会造成影响，采用线性计量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显示，前期发生的事故必然会导致后期安全规制水平的提高，而在没有其他外力影响情况下，这种事故冲击所造成的安全规制水平提高将会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表明事故发生之后，煤矿安全规制体系所进行的自我弥补过程；采用非线性计量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结论表明，煤矿安全规制大致表现为“U”形，并且可以划分出三个运行状态，即低于下限临界值的低规制水平状态，高于下限临界值且低于上限临界值正常状态以及高于上限临界值的高规制水平状态。在正常状态下，煤矿安全规制是有效的，在高水平规制状态或者低水平规制状态下，安全规制是无效的。

(4) 以“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和“奶业标准降低”事件为例发现，在当前地方政府激励模式下，地方政府经营化倾向日益显著，由于行业以及企业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完成经济目标十分重要，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势必会结成天然的同盟，这一同盟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并对社会性规制体系的制定与执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旦社会性规制难以对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约束，逐利倾向以及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将促使某些企业出现违规现象，并逐渐蔓延至整个行业，而当这种行业性违规行为突破经济社会所能承受极限、成为严重影响社会或者市场秩序行为的因素时，中央政府将会介入，在短时间破坏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同盟关系。此时，社会性规制成为应急管理的工具，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行业都产生了巨额成本。随后，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意识到这种成本是难以承受的，需要对规制体

系进行调整而中央政府在短期内又无法改变当前的激励模式时,两者将达成新的妥协,即中央政府选择降低社会性规制标准,避免对地方经济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以换取地方政府对社会性规制的重视。

从解决安全问题角度出发,这一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一是短期内中央政府以及省级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地市一级地方政府在安全方面的考核力度,强化安全生产的重要程度,使其不敢轻易通过降低安全规制的方式来刺激生产;二是加强对社会舆论监督的支持力度,保障其言论自由的权利,并重视媒体所报道的安全生产问题,使其成为监督地方政府安全规制的主要力量;三是长期内应从提高规制机构独立性角度出发,继续深化安全规制体系改革,使内生性规制逐渐成为外生性规制,弱化其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四是逐渐改进事故发生之后的“一刀切式”治理方式,明确事故责任,避免大量间接规制成本的产生,给地方政府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从而鼓励其降低安全规制水平。

本书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特色重点学科资助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波动的形成机理、实证影响与治理研究”(71173032)的资助。此外,本书出版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卢小生编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中央—地方两级政府激励模式究竟影响了什么	3
第二节 安全规制波动的提出	9
第三节 来自真实世界的证据	15
第四节 本书主要观点	20
第二章 现代规制经济学理论综述	23
第一节 现代规制经济学发展脉络	24
第二节 现代规制经济学核心理论	26
第三节 社会性规制：现代规制经济学新领域	28
第四节 规制经济学实证主义：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	30
第五节 制度环境与规制经济学的融合	35
第六节 实证主义引领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激励问题研究	46
第七节 地方政府激励与社会性规制的冲突： 规制波动现象的简单阐述	51
本章小结	53
第三章 规制波动的模型解释	54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54
第二节 基础模型	57
第三节 最优均衡	60
第四节 均衡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64

2 政府激励与规制波动：机理、影响与治理

本章小结	67
第四章 规制波动模型的拓展	6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68
第二节 模型设定	73
第三节 最优合同与扩展	76
本章小结	85
第五章 规制波动影响的经验证据	87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87
第二节 直观动态模型描述	89
第三节 非线性平滑迁移回归系列模型及其适用性分析	92
第四节 数据、模型与估计	95
第五节 估计结果分析	98
本章小结	102
第六章 内生性视角下的煤矿安全规制波动影响	104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04
第二节 内生性规制影响的线性分析	106
第三节 内生性规制影响的非线性实证分析	109
第四节 对主要研究结论的进一步分析	114
本章小结	116
第七章 煤矿安全规制与信息披露	11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18
第二节 理论阐释与模型框架	119
第三节 煤矿安全规制实证分析	124
本章小结	129

第八章 规制波动视角下的乳制品行业安全	13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31
第二节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与“奶业 标准降低”事件：案例介绍	134
第三节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经济后果	138
第四节 “奶业标准降低”事件的博弈分析	156
本章小结	163
第九章 基于规制波动的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治理	165
第一节 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特征	166
第二节 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波动问题成因	170
第三节 发达国家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经验借鉴	177
第四节 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体制重构	179
第十章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与研究展望	185
第一节 主要结论	185
第二节 政策含义	188
第三节 研究展望	191
附 录	192
参考文献	213
后 记	229

第一章 导论

在当前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当中，从政治性激励与经济性激励视角出发完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最受关注。这一理论认为，作为处于转型期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采取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模式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构建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之间政治性激励与经济性激励制度，有效地解决了行政分权与经济分权两个主要难题，成功推动了地方政府对取得高速增长渴望，有效提升了地方政府系统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执行力。正是在地方政府强大执行力保证下，改革开放之后，由中央政府采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使得经济高速增长最终成为现实。然而，现实事物发展均存在两面性。在取得高速增长同时，中国所采用的激励模式使得经济增长在各级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导致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被扭曲，弱化了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职能，甚至出现公共管理职能被用来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极端情况，直接表现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等一系列公共管理问题恶化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经济研究范式中关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基本假设不适用于作为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出发点。这是目前许多中国经济现象难以通过西方经济理论进行解释的重要原因。那么，如果从政治性激励与经济性激励视角理解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等一系列公共管理方面的问题，探究各类事故频发且难以治理的根源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会得到何种结论呢？进一步地，是否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予以改进？这是本书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安全事故与污染事故发生率以及伤

2 政府激励与规制波动：机理、影响与治理

亡人数长期都居高不下。然而，从时间节点上看，环境、健康与安全等一系列公共管理问题真正受到关注是在 2003 年中国人均 GDP 首次超过 1000 美元之后，相当部分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已由吃饱穿暖转向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体验，加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纵向与横向考核范围不断加大、媒体舆论监督力度的增强、互联网高度发展使信息传播的加速以及相关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过度偏向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很难被民众接受。在发生事故或其他突发状况时，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相机抉择办法，出现了“运动式执法”、规制浮于表面等现象。本书将其称为“规制波动”。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规制波动是理解当前环境、健康与安全等公共管理问题起因、传导路径以及治理的关键。

从制度演进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推高了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导致公共管理制度设计问题的暴露并且放大了其影响，逐渐形成推动制度革新的力量。因此，消除规制波动现象本身也是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完善和提升的过程。虽然政治性激励与经济性激励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目标，但其作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能改变政府属性，社会福利最大化依然是政府的基础职能之一。随着环境、健康与安全等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职能势必将出现回归，这将不仅仅是对原有激励模式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微调，而将是一次范围和规模的变革，理解规制波动现象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次变革。那么，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的激励究竟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引人关注？以及中央—地方两级政府激励究竟影响什么？第一章从政府激励角度对全书研究背后的逻辑以及基本观点进行概述，最后讨论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贡献和不足之处。

第一节 中央—地方两级政府激励 模式究竟影响了什么

一 关于政府激励

所谓政府激励，就是中央政府通过政治或经济的双向激励手段，如政治晋升制度、财政分配比例、转移支付与政府补贴等，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激励地方政府投入更大的努力程度去完成中央政府所布置的任务，如经济增长、治理本地环境污染等。政府激励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在于，以阿西莫格鲁（Acemoglu）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通过观察比较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趋势，逐渐意识到政治制度以及治理模式是除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外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甚至有经济学者认为，围绕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所开展的研究将成为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革命。事实上，从制度视角出发，的确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何以亚洲“四小龙”、中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均并无积累前提下，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北京共识”。^①

亨廷顿（Huntington）在其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性质，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与执行力。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过程来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后，原有按照计划经济所建立的政府结构及其职能设计已无法满足新的发展模式要求，需要进行完善与创新，否则，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就可能落空，完成政府结构及其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便是如何将地方政

^①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中最重要的核心原理就是保持不断创新，而这里所谓“创新”，相当重要的部分指的是一系列政治治理模式上的突破。拉洛（Rallo）在“北京共识”中提出，中国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追求稳定的改革，它本身现在就是政治制度要求权力垄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政治制度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向能力为基础的转变”，这与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持有的观点非常类似。

府职能由计划经济时代中的被动执行中央指令，转变为主动推动经济增长，换言之，就是如何重塑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治性激励与经济性激励。正是在稳妥处理好这一问题基础上，保证了政府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足够的执行力，中国才能将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两者相互结合、互相影响，才最终形成了中国现有的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在这一混合模式下，政府部门所发挥的作用既不同于计划经济，又有别于市场经济，成为保障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有力保障。

如果仅从宏观经济绩效来看，中国当前采用的政府激励模式非常成功。然而，如果将考核范围扩大，这一政府激励模式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其中，最明显的是，这一政治激励模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度追求，将粗放的生产要素投放视为关键指标，忽略了政府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健康与安全等公共管理问题的监管。于是，高污染、高事故的发生便成为与高经济增长一起的常态。以工作场所安全事故为例，从统计指标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产安全问题一直比较突出。1990年以来，中国各类事故死亡总量每年以超过6%的速度在增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717983起，总计死亡127089人，中国工矿企业10万人死亡率为10左右，其中，煤炭行业从业人员10万人死亡率高达109.1，非煤采矿业为80.2，化学工业和建筑业分别为10.26和9.95；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627158起，总计死亡112822人，中国工矿企业发生事故12065起，死亡14382人，其中，煤炭企业发生2945起，死亡4746人，非煤采矿业1869起，死亡2271人；2005—2006年，全国平均每天发生约8起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每周发生近2.4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重大事故，每月发生1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2007年，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506376起，死亡101480人。^①

上述数字表明，中国采用的政治激励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非

^①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资料整理，<http://www.chinasafety.gov.cn>。

常有效,但在解决环境、健康与安全等公共管理问题方面,却存在先天的缺陷,政府的执行力出现了较大问题。随着国民经济实力提升,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使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受到质疑,也使现行地方政府激励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社会矛盾的积累很可能会反噬经济领域取得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对现有的地方政府激励模式进行调整,甚至全面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政府激励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央政府激励模式固化造成的;另一方面,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收入增加,民众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虽然政府激励模式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完成了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目标,但它在解决诸如安全、健康和环境此类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证明。同时,中央政府在不改变诸如财政分配等基本制度设定的前提下,不断将福利目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中的一系列做法,则带有鲜明的“摸着石头过河”色彩。当在社会福利以及经济增长两方面都同时面临强大压力情况下,地方政府所具有的目标函数随之出现严重的双重化倾向,不得不采取政策目标短期化的方式应对,而这也使中国出现了许多用传统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本书所讨论的安全规制波动现象,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

二 中央—地方两级政府激励的形成与演进

本质上说,政府激励模式的形成与演进过程,就是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三方面矛盾相互作用的直观表现。从财政制度角度来讲,地方政府激励问题实际上是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分配上的直接博弈。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之间关系的演进历程,这种博弈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存在,封建时代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问题上曾经历不计其数的博弈,前后发生了八次规模较大的变革(王军,2009)。出于维护政权目的,各个封建朝代大多采取中央政府强力集权的方式,但始终难以解决过度集权所产生的财力枯竭问题,最终导致王朝的颠覆和更迭。

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做到

既保证中央政府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又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投身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国民经济效率，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高涨的建设热情以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激励存在的意义并不突出，此时的中央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大部分权力，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执行者的角色。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建设热情消退、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的弊端开始暴露，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已变得非常低下，生产物资与生活物资都十分短缺，效率问题变得愈益突出。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选择了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分地区、分阶段地向地方政府下放经济与行政权力，以期激活国民经济发展活力。谢庆奎（2000）在对这一权力下放过程进行分析之后认为，中国式地方政府分权带有以下三种趋势：倾斜分权、纵向分权以及经济分权。这种分权方式伴随其他领域的改革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实现了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由于这一阶段改革带有较强的普惠性，效率目标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地方政府在获得权力之后，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是被广泛接纳的。此时，由于社会经济形态已接近公平与效率中的角点解，因而，在经济逐渐展现出繁荣景象的同时，公平目标（至少是低程度的公平目标）的实现情况也随之有所改善。此后，随着相关地方政府激励政策产生的效果逐渐显现，中央政府更加注重推进旨在向地方政府进行权力下放的改革，诸如财权与事权等都是下放的核心内容。这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地方政府权力得到扩大的同时，地方财力也随之大幅提升（见图1-1）。

随着分权改革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财政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地方政府的高激励水平相伴，出现了中央财政的极大困难，甚至不得不向地方财政借款以维持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改革还需要中央政府具备强大的财政能力作为支撑，屡次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使中央政府面临丧失国民经济控制的风险。这些都为之后影响深远的分税制改革埋下了伏笔。1994年，中央政府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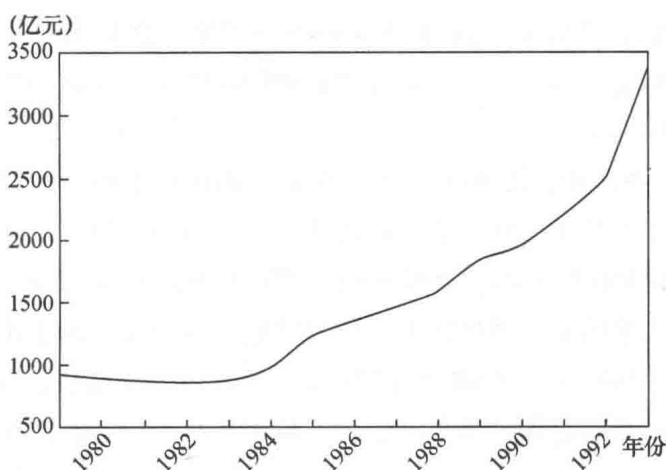


图 1-1 1979—1993 年地方财政收入

于在重重压力下再次进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其财权与事权关系也得到重新配置。从激励角度看，这次分税制改革成为对此前地方政府激励的一次重大调整，但通过此次改革，中央政府仅仅强化了对于预算内财政的集权，却没有相应地减少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与负责公共事务方面的责任，最终形成了现今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激励模式。

三 当前中央—地方两级政府激励模式的负面影响

在了解地方政府激励模式的形成与演进历程之后，再去理解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就会更为容易。与传统计划经济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模式相比，当前较为宽松的地方政府激励模式无疑在提高效率方面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能体现“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事实上，为了更好地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与约束，基于发展国民经济需求，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绩考核体系也是依据效率原则加以设置的。在面临来自政绩考核以及发展本地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经济增长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也使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但是，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方政府激励模式不仅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动力不足的迹象，还无助于环境、安全、健康等问题的解决，甚

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助推了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出现。经过总结，本书发现，地方政府激励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增长压力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偏好过度投资，造成全国各地大量出现重复建设的情况

由于政府投资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当地 GDP 增长水平，十分符合政绩考核体系的增长要求，普遍被地方政府视为发展本地经济的有效途径。1997 年，东南亚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最终扩散至全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为应对危机，并保持国民经济的发展活力，中央、地方两级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顺利地渡过了难关。此后，虽然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减弱，但是地方政府依然保持较高的投资热情，不仅没有减少政府投资，反而在投资规模上有所加大。这种情况到 2009 年则更为严重。为应对兴起于美国“两房”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颁布了两年“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投资的偏好达到了顶峰。数据显示，2009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新建投资累计达到 90313.77 亿元，固定资产扩建投资累计达到 30488.32 亿元，增速分别为 37.2% 和 25.1%；到 2010 年，虽然增速有所降低，分别为 26.8% 和 12%，但两项投资累计达到 114151.46 亿元和 33927.37 亿元。

（二）现有激励模式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同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系

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对政治晋升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官员升迁往往是由所辖行政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就产生了十分激烈的竞争关系，进一步地，企业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与地方政府则会随之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本地企业，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出现“公司化”倾向，而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违规行为往往会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